

幸福的回忆

陈 帼 香

30年前，我曾作为浙江省赴京汇报演出队的成员，在首都长安剧场受到了周恩来总理的亲切接见，这是我一生中最大的荣幸，此情此景至今仍记忆犹新，使我终身难忘。

那是1958年4月，我还是吴兴县中心越剧团的一名青年演员，组织推荐我参加了省创作剧目会议。会议期间，胡小孩、顾锡东等同志编写了一组反映时代新貌的现代小戏《关不住的姑娘》、《一日千里》、《不准随地吐痰》、《风雪摆渡》。让我和金华越剧团的杨琴芳、杭州越剧团的王颐玲等几位同志分担了角色，由著名艺术大师盖叫天为我们辅导。彩排后，省领导很满意，于是就决定赴京汇报演出。

在京演出四十天，场场客满。开始，文化部周扬等领导同志观看了演出，周扬同志还在百忙中特地和我们浙江的演员进行了座谈，对我们的演出给予了高度赞扬，鼓励我们多演反映时代精神的现代戏，还要求我们努力提高艺术质量，更好地为人民服务、为社会主义服务。

“五一”后的一天，省领导传来喜讯，晚上，周恩来总理要来观看演出。顿时，大家都沉浸在无比的兴奋之中，演

出格外认真。……戏毕，已是晚上十点多钟了，敬爱的周总理在周扬同志的陪同下，兴致勃勃地来到后台。总理身穿灰色中山装，外穿一件淡灰色的大衣，浓眉下一双智慧的眼睛，慈祥又可亲。大家向他围拢来，他一边亲切地问候大家，一边和大家一一握手……。当总理和金华越剧团的演员杨琴芳同志握手时，总理关切地问道：“你们金华越剧团的演员宿舍造好了没有？”杨琴芳同志激动地回答：“已经造好了”。

杨琴芳同志告诉我们，四年前，总理曾在杭州解放剧场观看过他们的演出。当时，总理了解到他们还没有团部……。总理日理万机，却连这么一件小事也记牵在心，真是对我们演员无微不至的关怀。

当总理和我握手时，他看了我一眼，十分和蔼地问：“你是哪个剧团的？”我回答说：“是吴兴县中心越剧团的。”总理微笑着点点头，不假思索地说：“哦，你们吴兴，业余文艺搞得也很好。”

啊！总理对我们吴兴是多么熟悉、关心。我心里感到由衷的崇敬和高兴！据省里的一位同志说，总理曾在北京观看过我县演出的业余文艺节目《采菱舞》、《缫丝舞》、《鹬蚌相争》等。

……夜深了，总理不知疲倦地和我们一起交谈，合影留念，总理站在我们演员中间，我们簇拥在他的周围……。

30年过去了，每当我回忆起这一幸福的时刻，我的心就沸腾起来。他的恩情暖人心，他的光辉形象永远印在我的心坎上，永远激励我沿着党指引的文艺方向前进。

1987年7月郑炳荣整理

（本文作者陈恂香，系湖州市越剧团团长、省政协委员。）

难 忘 的 演 出

张 雪 麟

每个人的记忆宝库里都有永志难忘的“珍藏”。我和严小屏毕生铭记的一次经历，是1985年“五一”节，在西子湖畔为陈云同志说唱评弹《董小宛》。……

1985年4月底，我刚从苏南演出归来小休，准备5月份在上海西藏书场演出。省曲协主席施振眉同志突然打电话来，要我和小屏两人30日赶到杭州，有重要演出任务。翌日，我俩赶到杭州指定地点住下，省文化厅有关领导，到下榻处来看望我们，并明确告诉我们是给陈云同志演出，叮嘱我俩一定要演好。

“啊，是给他老人家演出！”听到这一喜讯，我俩顿时兴奋起来。陈云同志是深受人民爱戴的党和国家领导人，他关心评弹艺术，关心我们评弹艺人，对评弹这门艺术有精湛的研究。书苑能有今天这番姹紫嫣红的繁荣景象，是和他这位园丁辛勤培育分不开的。在评弹界，向来视为能给他老人家演出和聆听他的指教而引以为荣。今天，这样的机缘落到了我俩——县评弹团演员的身上，而这正是我和小屏向往已久的心愿啊！

“一定要挑一回最好的选段，向他老人家汇报演出！”

我们立即着手从自己的保留节目中精心挑选了《董小宛》中《参相》一回。“董”书是我俩化了四年心血创作出来的长篇历史传奇弹词，在江、浙、沪演出时，很受欢迎，被评论界誉为“唱不败的《董小宛》”。《参相》一折人物集中，情节曲折，适宜双挡演出。于是，就决定演唱这一回。但是，当一想到他老人家是评弹行家，什么名家响挡没听过，说噱弹唱，那样不精通……，我和小屏能行吗？他老人家会喜欢《董小宛》这部书吗？我们的心又忐忑不安了。

激动人心的时刻终于来到了。“五一”这一天，阳光明媚，春意盎然。上午专车把我们送到西子宾馆，略事休息，更装。我换上了银灰色的长衫；小屏今天身着一袭深色丝绒长旗袍，益显得端庄娴雅，眉宇间透出几分内心的兴奋、紧张。省文化厅孙家贤厅长，看出了我们内心的不安，他鼓励说：你们不要紧张，要把功夫都充分发挥出来！施振眉同志也在旁轻轻地关照说：“尽量发挥评弹艺术的特色，不要拘谨”。

该我们上节目了。我们步入礼堂，在演出位子上坐定。照明灯雪亮的光柱落在身上，照相机的闪光灯闪烁闪烁，录象机在两旁沙沙作响。我习惯地抬起头来，环视场内观众。啊！陈云同志就端坐在我的前面；两边分坐着江华、王芳、薛驹、李丰平等首长。只见他老人家戴着耳机，身穿浅色的中山装，微笑着，和蔼慈祥地望着我们。一股幸福的热流卷过我的全身。这时，各种杂念顿消，一心想的就是把《董小宛》说好。一开场，轻捻丝弦，先放了只噱头，细察他老人家的反应，试试效果。他老人家不愧是行家里手，当即忍俊不禁地笑了。看到这情景，我俩信心陡增，就拨动琴弦，轻拢慢捻，全神贯注地施展起说、表、弹、唱的全套功夫，淋漓尽致

地演唱起来。

曲终琴歇，掌声四起。陈云同志在首长们陪同下走上前来，和我、小屏热烈握手，亲切地问我俩来自哪个评弹团？我回答说：“是德清县评弹团。”他侧过脸认真地听着，发出健朗的笑声，高兴地说：“很好！很好！”这时，春潮般的掌声在礼堂里激荡，照相机的镜头又一次包围了我们。我和小屏沉浸在欢乐、幸福的海洋里，直至他老人家离去很久，很久，还激动得什么话也说不出。……

（本文作者张雪麟，系德清评弹团演员、湖州市曲协副主席、浙江省曲协理事、中国曲协会员。文中所提严小屏是张雪麟的爱人）。

（本文由德清县政协文史委员会供稿）

陈 云 赠 朱 仲 丽 条 幅

1983年夏天的一个晚上，在中南海西楼，于若木同志笑着对朱仲丽同志说：“陈云同志为你写了张条幅。”又说：“写的是‘横眉冷对千夫指，俯首甘为孺子牛’。请上我家拿去吧！”

朱仲丽是王稼祥同志的夫人。她感到太突然了，怀疑自己是不是听错了。她显露出幸福的神情，瞪大了眼睛望着于若木同志，半天才问：“真的呀？！”陈云同志年已八旬，运用神笔，蘸饱了墨汁，寓意深刻地表达了对王稼祥同志的怀旧和对朱仲丽同志的鼓励。她表示要按照鲁迅先生名言的精神度过晚年，决不辜负陈云同志的期望和鞭策。

——1985年2月4日《工人日报》

一代宗师吴昌硕

施星火

吴昌硕先生生前，曾手镌巨印两方，文曰：“湖州安吉县”、“此身只合住湖州”，借以寄托他对家乡的赤子之情。他一生走南闯北，行踪无定，而在所作书画上往往自署“安吉吴昌硕”，迄晚岁而尤然，可见他对印着自己儿时足迹的故土眷恋之深。

吴昌硕（1844～1927）出生于安吉县章吴村清寒的书香门第。他的先祖和父亲都能诗，父亲辛甲先生还擅刻印。他幼年由其父启蒙识字，后进乡塾，同时参与稼穡劳动，还放过牛。14岁开始学习刻印，深受父亲的熏陶和指点，从此终生与之，“癖斯”不疲。17岁那年乡里遭兵祸，举家避难远方，辗转逃亡，困苦不堪。21岁回家，全家9口仅存父子2人相依为命。翌年秋补考庚申科秀才，他在学官督促下勉强前往应试得中，从此就绝意场屋。中年以后生活仍极窘迫，但他读书习艺的志向毫不动摇，在厕身下僚、生计维艰的情况下，还是千方百计寻师访友，力求艺事上的进境。他曾先后师事施旭臣（浴升）、俞樾（曲园）、杨岷（见山）等，向他们请教诗词、训诂和书法。并在潘祖荫（伯寅）、吴云（平斋）、吴大澂（愙斋）处获见古代彝器和名人书画，广采博取，眼

界大开，为往后的深造打下坚实的基础。40岁那年在上海得识著名画家任颐（伯年）从他问画法；彼此交往甚密，关系在师友之间。吴昌硕又与蒲华（作英）、胡远（公寿）、张熊（子祥）、陆恢（廉夫）、诸宗元（贞壮）、沈瑾（石友）等人友善，经常在一起切磋琢磨，于是技艺大进，勇攀高峰。

昌硕先生早年聘夫人章氏，安吉过山村人，未成婚而歿。29岁时在安吉娶夫人施氏，吴兴菱湖人，名酒，字季仙，小于先生四岁。夫人知书明理，也能篆刻，伉俪感情弥笃，从《缶庐集》中保存着的那些情真意切的“寄内诗”中可见一斑。夫人相夫教子，备极辛劳，早于先生十年逝世。儿子涵（子茹）、迈（东迈）和孙子志鲁（季道）、志源（长邨）等都克传家学，蜚声当世。

昌硕先生爱“才”如命，奖掖后进不遗余力。他的及门弟子早期有陈师曾（衡恪）、赵子云（石农）、李苦李、潘天寿等，后期有沙孟海、王个簃、诸乐三等，均一时俊彦，各有千秋。

吴昌硕先生之所以能熔诗书画印于一炉，决非偶然，而是决定于他那淳朴高尚的“人品”。谈到昌硕先生的人品，首先应当提到的就是他力学不倦，矢志不移的精神。吴昌硕成名之后，有人为文称赞他是个天才，他颇不以为然，对身边的后辈和门生们说：“我不过中人之资，谈不上什么天才。要说有什么长处，无非是刻苦力学，坚持不懈而已。”事实上，综观他的一生，求学问永不自满，对事业锐意进取，数十年如一日，概括地说，就是做到了“勤奋”这两个字。如果说他的成功有什么诀窍，那么这“勤奋”二字，也

许正是唯一的诀窍。

笔者早年曾亲聆表伯东迈先生讲述昌硕先生刻苦学艺的感人事迹。他说：昌公幼年就酷爱刻印，家贫无力购买刀石，就以废铁制刀，以废砖代石。刻得久了，左手无名指受刀伤溃烂，由于当时山乡缺医少药，手指竟烂去半节。东迈先生又曾出示一个砂石砚池，说道：“这是昌公的门生虞山赵石农所赠，他晚年常用它，竟把它磨穿了一个小孔。后经石农修补，还继续使用。”这就是“石砚磨穿”的故事。此砚现存安吉吴昌硕纪念馆。

中年时期，吴昌硕旅食四方，依人作嫁，每以“酸寒尉”自嘲。有时甚至贫困到“床头无米厨无烟，腰间并无看囊钱，”只得“掩关独立饥看天”的地步。但不管处境怎样艰困，他对艺术的追求却是“穷且益坚”，毫不动摇。直到晚年还是寸阴是竞，以读书作画为“日课”，从不或辍。逝世前三天还画了一帧水墨兰花，这幅画苍劲郁律，意气横溢，毫无衰颓之态。这幅珍贵的“绝笔兰”，昌硕先生弥留时遗言赠与他的得意门生王个移先生留念。解放后由王先生捐赠杭州西泠印社吴昌硕纪念馆保存，以垂久远。

其次值得提出的是他那谦冲恬淡、平易近人的性格。尽管齐白石极力推崇说：“老缶衰年别有才”。吴昌硕却一贯以“山里人”自居，绝不自矜其能。晚岁在给西泠印社撰写楹联时自称“一耕夫来自田间”；80岁撰自寿联时，还以“虬髯切莫傲人”来告诫自己，可见他律己之严。吴昌硕秉性朴实无华，忠诚厚道，始终不失劳动人民本色。他敝屣功名，不慕荣利，自奉甚薄而待人至厚。56岁时，由于一个偶然的机会，被保举任安东县（今江苏涟水县）令。因不惯于

逢迎，到任未两月就辞去，从此以布衣终其生。后来他每以“去官先彭泽令五十日”自况，并尝自刻印章“一月安东令”明志。

昌硕先生住的是极普通的“弄堂房子”，在家里常穿宽博的旧布衣，经常茹素，不爱吃油腻珍馐。即使到了晚经济宽裕时，仍然保持着早岁的生活习惯。

每当他作了比较惬意的画，就张挂壁上，请友人品评。对他们提出的意见，总是择善而从，绝不自以为是。有时晚辈或门生指出瑕疵，他也能虚心接受，不以为忤。青年人持着书画来求教，他往往笑容可掬地连声说“好！”然后再作具体分析，提出意见，指明努力方向。

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点，就是昌硕先生畛域分明，热爱祖国精神。

如所周知，昌硕先生晚年特别受到日本艺术界人士的崇敬，因此结识了许多日本朋友，其中几位还交往甚密。可是遇到原则性的问题，他却是丹诚为国，寸步不让。有名的“《汉三老碑》事件”就是一个显著的例子。《汉三老讳字忌日碑》是我国的珍贵文物之一，光绪《余姚县志》曾誉之为“浙东第一石”。1921年间，这块碑石被人运到上海，准备以重价售与一个旅沪日侨，运往日本。吴昌硕得知这个消息，愤慨万分，投袂而起，毅然以抢救这一珍贵文物为己任，登高一呼，四方响应。他邀集友人商酌，用募捐和书画义卖等方式，经过几个月的努力，好容易筹齐8000银元巨款，将这块碑石赎回，交由西泠印社建造石室永久保存。他这种爱国主义精神是很值得我们钦佩和学习的。

甲午战时，吴大澂督师北上御寇，昌硕先生参与戎幕随

行。清军惨遭败绩，先生目击心伤，发于吟咏，在所作《榆关杂诗和恹斋先生》中就有这样一首：

凭吊忠魂歌莫哀，
传闻邓禹绘云台。（原注：邓军门世昌八月十八日海战歿。）

可怜旗鼓伸天讨，
未见珊瑚入贡来。
谢傅围棋终破敌，
班超投笔敢论才。
妖星看挽强弧射，
独夜营门遣酒杯。

忧国忧民之心跃然纸上，风格颇似同代著名诗人龚自珍（定庵）。

吴昌硕生前，南北各地水旱灾害频仍，他感到己饥己溺，触目惊心，奋起救灾，不遗余力。他曾亲往灾区放赈，又曾多次参加书画义卖，利用自己的声望，筹集巨款赈济灾民。并曾与王震（一亭）合作绘制《流民图》，普遍发行，为广灾黎请命。

吴昌硕晚年实至名归，鬻画收入激增，照理他大可尽情享乐一下，可是他却竭力克己利人，多方慷慨“散财”。遇到家境清寒而才具出众的门生，他不仅不收分文贐金，还在生活上长期予以资助，使他们能专心学艺，无衣食之忧。对亲友和族人，他敬老怜贫，解衣推食，悉心照拂，更加无微不至，这样的事例不一而足，遗风所及，他的门生和子弟也以助人为乐。此外他还曾经捐资办学，嘉惠家乡后辈，迄今为乡人所称道。

1987年元宵节，完稿于菱湖

吴昌硕先生的家世与学年

· 王 季 平 ·

我国近代艺术大师，浙江西泠印社首任社长 吴 昌 硕 先生，原名俊，又名俊卿，号香补，别号缶庐，清道光二十四年（公元1844年），出生于安吉县鄞吴乡鄞吴村。

昌硕先生出生在一个世代书香之家。祖父吴渊，名应保，字和甫，别号目山。清嘉庆戊午（1798年）科举人，曾任截取知县，嘉兴府海盐县教谕、孝丰古桃书院山长等职，是一位颇具名望的教育家，著有《天目山房诗稿》。叔祖吴应起，为嘉庆戊辰科举人，少有“神童”之称，及长，渊博善文，京师称之为“两脚书橱”。吴渊有四子，名开甲、逢甲、先甲、辛甲，吴辛甲就是昌硕先生的父亲。

吴辛甲，号周史，又号如川，原为孝丰县廪生，清咸丰元年中举，因不恋官场生活，仅一任截取知县后即回归故里，以耕读为生。辛甲性喜吟咏，尤擅金石篆刻，他将自己的毕生诗集定名为《半日村诗稿》（因鄞吴村柳树成荫，被称为“半日村”）。由于他对金石篆刻的癖好，从而对少年时代的昌硕先生有着极为重要的影响。

辛甲生三子一女，昌硕先生为其次子，他虽出身书香门第，但童年就热爱劳动，七八岁时即随父下地干活、放牛，

其所著的《缶庐诗》、《鄞吴村杂诗》中有“耕荒叱叱驱晨犊，倚树沙沙落晚虫”的诗句。

吴昌硕先生自幼醉心篆刻，在他家乡许多古代建筑艺术的熏陶和他父亲的影响下，竟至废寝忘食。买不起那么多刻章石，就到古坟上去捡砖瓦片。白天没有空，就晚上在如豆的灯光下，于方寸之间驰骋着自己的丰富想象。“三更风雨铎焰碧，墙荫蔓草啼鬼工，捐除喜怒去芥蒂，逸气勃勃生襟胸。”道出了少年吴昌硕潜心篆刻的甘苦。

昌硕先生之母万氏，是个注重实际的妇人，见儿子矢志篆刻，少习诗书，尝告诫道：“儿呵！今日诗书少习，将后安能踞文？”其意即欲昌硕先生专心读书，谋求功名。但昌硕另有主见，在“刻印”中又写道：“刻画金石岂小道，谁得鄙薄嗤雕虫？”因此，他在父亲的指导下，更加坚定了钻研篆刻的意志，发奋探索，为他日后在篆刻艺术道路上进行精湛的深造，打下了坚实的基础。

清咸丰十年（公元1860年），昌硕先生17岁年届弱冠。时太平天国革命正处于后期，太平军自安徽广德进攻安吉，席卷鄞吴村，清军与地方团队顽固抵抗，战斗激烈。昌硕先生父子及时躲入村南玉华山背后石苍坞而幸免于难。而其祖母严氏、生母万氏、兄弟祥卿均先后在战乱中死于石苍坞。其已聘待配的未婚妻章氏，也在战乱中遇难，死于安吉。战后，昌硕先生为纪念这次避难地——石苍坞，乃将自己原名俊卿改为“昌硕”。

公元1865年，即清同治四年，昌硕先生22岁，当年参加安吉乡试告捷，科中“秀才”，次年，他从师施旭臣（浴升），续攻诗及书法，由于他勤学苦练，学艺大进，极得施

师赞赏。施曾为其《缶庐诗》作序，崇之“吾友吴子苍石，性孤峭，有才无进……其胸中郁勃不平之气，一皆发之于诗。”

昌硕先生耕读之余，篆刻有上百方自认为较满意的作品，曾有“时作古篆寄遐想”的诗句。

1870年，他以自己的书斋“补巢”为名，出版了第一部篆刻集——《补巢印存》，其师施旭臣并为之作序。

昌硕先生的刻苦精神，更激励了他的远大抱负。1871年9月，他终于离别了哺育他27个春秋的故乡——安吉，泛苕溪而下，开始了他艺术道路上新的奋斗。

（本文由安吉县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供稿）

周总理关心刘海粟和徐悲鸿

1953年周总理在北京约见刘海粟，从晚上11点谈到凌晨1点多。总理鼓励刘海粟挑起美术教育的重担，并希望美术界要团结，各种流派的代表人物要齐心协力，为新中国多培养一些人才。总理要刘海粟不要听外面一些不负责任的传闻，要和徐悲鸿先生搞好团结，诚恳地说：“刘老，你和悲鸿都是从反封建中战斗过来的，为美术教育事业冒过风险，过去也有较深的友谊。悲鸿近年来患病住院很久，感情容易冲动，你要谅解他”。刘海粟回答说：“总理，您放心，悲鸿的性格和性情，我是了解的。今后，只要我们彼此多体谅，谣言就会不攻自破！”总理高兴地说：“你们两位团结一致，我们美术教育工作就好办多了，人才也会多培养出来。”

——《浙江日报》1985.8.28

回忆沈尹默先生

费在山

沈尹默先生于1971年逝世。今天我回忆与乡先生相识的经过，往事犹历历在目。

1961年冬天，笔者在湖州市商业局工作时，陪同王一品斋笔庄负责人去上海访问当代知名书法家沈尹默先生。在上海北四川路海伦路的一幢日本式普通楼房中，我们会见了沈老。进门时，见他正伏案写字，他那写字的姿态很特别，脸部几乎碰着了纸，原来他是高度近视眼。他见客来，示意客人先坐下，而自己继续写字，直至手上那幅字完毕，这才立起身来说：“非常对不起，要你们久等了”。其实，是我们干扰了他写字，是客人对不起主人。虽然，主人也可以停下笔来招呼客人，但沈老没有这样做，他对艺术创作如此一丝不苟的精神，使我受到了感动。

沈老一边看我们带去的湖笔，一边说：“湖州的毛笔闻名全国，我是湖州人，感到光荣”。接着他从选毫、札头、入管等方面提出了不少诚恳的意见。后来，我把这次谈话写成一篇文稿，寄给沈老审定时，他提出制笔者要南北交流，发挥各自所长，还建议将来向日本学习。在60年代初，就能提出这样的见解，甚是难能可贵。

第二次与沈老会面时，他告诉我，他虽是湖州人，但从小生长在陕西。他说：“我是没有拎过家乡考篮（意思是未能回原籍应乡试），不是‘三考’出身，也没有上过‘洋学堂’，不是什么博士”。我插嘴说：“不是博士照样当上了大学教授”。他谦逊地说：“那是已经过去的事了”。

话题又回到了湖州，我问沈老湖州的老家在那里？他指着墙上挂的镜片说：“那里面有”。我急忙站起来，走到镜片前面，仔细一看，是一张四尺宣纸的四分之一立幅，秀丽的书法，抄录着沈老滞留重庆时所作的六首七绝，每一首都有关湖州的风物典故，抒发了作者思念家乡的情怀。这首诗未见刊行，特录于下面：

忆曾登眺弁峰巅，漫漫湖山欲浸天，
四十年中风浪阔，蜀江滩畔望归船。

碧浪湖心塔影长，道场山脚野花香，
当时拟借云巢宿，风恶惊涛不可航。

祭扫归来百感伤，十年去国恨河长，
春风又过黄泥岭，绿水青山草自芳。

摩肩彩凤坊头过，信步骆驼桥上行，
落落几人真识我，淹留今始愧无成。

桃柳岷山为好春，和风相趁出南门，
已嗟逸老风流尽，更与何人共酒樽。

门前击艇月河街，也向华楼小住来，

梅雨年年倍惆怅，东川一样两肥梅。

“门前击艇月河街，也向华楼小住来”，我问沈老，老家是否在东门华楼桥月河街附近？尹老说：“正是，在承天寺巷”，提起承天寺巷，我倒可以和沈老攀邻居了，因我家老屋后门在华楼桥堂子弄，前门就是承天寺巷，为了纪念这段先后邻居的因缘，我请尹默先生的四公子刻了一方“华楼旧家”的闲章；又请西泠印人韩登安先生刻了一方“家邻秋明故居”以志纪念。现在承天寺巷已拓宽，可以预料，“秋明故居”必将在这条幽静而古老的巷中诞生。

又一次会面，记得是一个下雨天，“落雨天留客”我在谈完公事后，就向沈老请教怎样练习书法。他说：“有人主张心正管直”，这个直字如何理解？我认为‘不直才能直’。我问这句话的含义，他说：“管直了，写出来的字未必直，管稍微侧一些，就不挡住视线，写出来的字就直，这也是辩证统一的规律呵！”他又说：“前人书法理论中有句话，‘如锥画沙，如印印泥’，‘锥画沙’容易理解；‘印印泥’就使人费解。其实，这两句讲的是一个意思，就是说稳而准，道理很简单。所以，对前人的书论不要去钻牛角尖，弄得很神秘，只要多实践，从实践中求答案”。我听了沈老这番话，真是茅塞顿开，如坐春风。

谈到苏东坡喜用鸡毫笔时，我问尹老，用鸡毫笔写的字究竟是什么模样？他站起身来，在一大叠字帖中翻出一本的其中一页，指给我看：这就是鸡毫写的。我一看，笔迹粗处象一团棉花，细处似一根发丝。沈老指着“棉花团”说：“这就是鸡毫的效果。因鸡毫笔锋尖而腰肥，易渗墨，难运

笔”。说着，他拿出一支鸡绒笔给我看，并说：“我也能写”。后来，我得到了沈老用“吴兴陆星槎制鸡绒笔”写的一帧横幅，气势非凡，墨趣横溢，不失为大家手迹。沈老一生写过不知多少书法作品，而用鸡绒笔写的却少见，我这幅是弥足珍贵了。

1963年，沈老在重阳节前，从上海到杭州参加西泠印社60周年庆祝活动。活动结束后，由印社社长、沈老的好友张宗祥（闾声）先生陪同前来湖州，同行的还有当时中共浙江省委书记霍士廉同志等。

沈老这次返里，是解放后第一次，也是最后一次。他告诉笔者，从小生长在陕西，连成家也在外地，只是民国前住在湖州老家，离别故乡已有46年，今日重返故里，真有“少小离家老大回”之感。

沈老下榻在飞英塔畔的原嘉兴地区招待所，行装甫卸，就到黄沙路王一品笔庄，与笔工促膝畅谈制笔技艺，又当众挥毫试笔，我见沈张两位老人兴致极浓，提议合作一幅画，沈老铺纸染笔，画了一幅风竹，闾老在竹旁添了一丛菊花并加跋云：“尹默画竹以书法出之，余画菊，既非画法，亦非书法，真可笑也，留此笑迹在湖州供人大笑”。沈老见后加了一首诗：“胸无成竹却画竹，赖他黄菊补不足，谓为清秋二友图，闾老自谦也多余呵”。想不到这个笑迹在十年浩劫中幸免于难，一直留到今天。

第二天，沈老参观了市容，漫步爱山台、韵海楼和骆驼桥，在参观爱山书院遗址（当时为博物馆）时，为墨妙亭题写了匾额，他还特地到天宁寺（当时为湖州师范）遗址考证了赵孟頫书写的“天宁万寿禅寺”六个石刻大字，他对笔者